

中国与韩国社会阶级意识的比较研究

李 炜

Abstract: Basing on a comparison of social survey data came from the studies of social classes and stratification both in Korea and China, the article analysis the differences in social class structure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and points out that social structure in Korea is more advanced than China in the modernization orientation as well as the class consciousness of its social members is more suite to their own objective class positions. Chinese society is just in transformation period and still lacks of a common discourse for expressing class member's consciousness. In a later-developed country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of class fomation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is the choice of development strategy by the guiding states.

中国与韩国比邻相居,有着长久的历史和文化渊源。19世纪后半期,又几乎同时受到西方文明的“挑战”。从那时开始,两个国家都开始了痛苦而艰辛的社会转型进程,即由经济上传统的农业文明国家,向现代工商业文明国家转型;由政治上专制集权的世袭政统,向具有现代意义的民主体制转型。在这重大的历史变迁中,各自的社会结构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也由此形成了各自的社会阶级与阶层的体系。因此,两个国家的社会阶级阶层的比较,有助于学人们了解和感悟由传统走向现代化的路径。

在本文中,我要将两国社会的阶级阶层的比较研究汇聚到阶级意识(class consciousness)这一专题上。这主要是因为,无论在哪一流派的阶级或阶层的理论中,阶级意识都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在马克思的阶级观点中,工人阶级要完成推翻资本主义的历史使命,必须要由自在的阶级(class-in-itself)转为自为的阶级(class-for-itself),这一转换的标志,便是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的产生。对于多元主义的阶级理论流派,阶级/阶层意识,有时唤作“阶级认识”(class awareness)、“阶级认同”(class identity),都是阶级群体的一个“集体理念”。对以文化—符号视角分析阶级阶层群体的布迪厄而言,他的“惯习”(habitus)概念的功能,也非常类似“阶级意识”。因此,我们可以说,在各家阶级理论中,阶级意识的有无,往往都是阶级形成(class fomation)和阶级排他(class exclusion)的标志。在阶级结构、阶级形成、阶级意识、阶级行动这一系列阶级分析的主题中,阶级意识无疑起着枢纽的作用。

因此,本文主要考察中国和韩国的民众的阶级意识的异同,并借以分析两国阶级意识背后的社会结构因素。

一、有关阶级意识的文献及研究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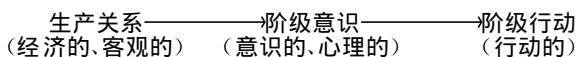
(一)阶级意识的概念

关于社会阶级阶层的理论思想脉络,大致有两大传承。一派是马克思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阵营的社会冲突的观点;一派则是来自马克思·韦伯的多元地位群体的视角。有关阶级意识的研究,也遵循这两条路线。

在马克思看来,阶级从根本上是简单地由生产方式的关系所决定的,这一生产方式的关系伴随着对资本所有者与非所有者的区分的界定。由于这种区分,就产生了在经济利益上相互对立的、具有明确边界的群体。这些群体逐渐发展出具有冲突性和区分性的社会和政治共同体,也就是阶级。马克思的阶级理论特别凸现社会制度对于社会阶级的决定作用。在他的思想中,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的占有制度

和资方雇用劳方的生产关系体制,造就了两大对立的社会阶级。

马克思赋予了工人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任务,但他并没有在理论上说明工人如何从经济的生产者转变为政治的行动者。在《哲学的贫困》一文中,马克思对阶级概念的类别作了区分:一个是自在阶级(class in itself),一个是自为的阶级(class for itself)。所谓自在阶级是指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张而带来的大量劳动者,他们的阶级角色是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体制所决定的。因之,尔后的社会学也称之为“客观阶级”,即他们是居于客观存在的社会阶级结构地位上的集群。自为阶级则不但在客观层面上,而且在主观上要对自身所处的阶级关系有明确的认识,确立自己作为归属的阶级之一员的角色感,即阶级意识。尔后才可能产生阶级意识驱动下的阶级行动,从而完成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正如奥索斯基所言,“采用经济标准为基础的阶级概念时,马克思有时引入心理的标准来对此概念的范围加以限定。符合社会阶级的经济条件人群,只有在他的成员被阶级意识,被共同利益的意识,被引发共同的阶级对抗的心理边界,联系起来才能成为完整意义上的阶级。”(Ossowski, 1963: 73)因此,根据这一逻辑,工人阶级的最终形成,端赖于自在阶级转化为自为阶级,端赖于阶级意识的产生。在这一阶级形成的逻辑中,我们又一次体察到马克思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规则的施用:



然而马克思有关自在阶级、自为阶级和阶级意识的观点也多受到质疑:作为受阶级结构制约的“自在阶级”通过何种方式达成“自为阶级”?如果客观存在的阶级始终未能自觉到主观的阶级利益知觉的层面,是否仍然是一个完整的阶级?阶级意识仅存于工人阶级之中,还是各个阶级都会享有其阶级主观统一性?即,阶级意识是无产阶级独有的,还是普遍弥散于各阶级的?

首先对马克思“阶级意识”做出详细阐述的,是匈牙利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格奥尔格·卢卡奇(Georg Lukacs)。他在写于1902年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潜心阐释马克思的“阶级意识”理念,并将之上升到无产阶级最终的历史使命得以达成的前提高度上。^①根据卢卡奇的界定,阶级意识:

……事实上是对生产过程中特定的典型地位所做出的适当的和合理的反应,而这些反应是“被赋予的”。因此,阶级意识既不是组成阶级的单个人所思考或感觉的东西的总合,也不是其平均数。而且整个阶级在历史上有意义的活动,最终是由这种意识所决定的,而不是由个人的思想所决定的——这些行动只能根据这种意识来理解。(卢卡奇,1986: 51)

可以看出卢卡奇所阐释的阶级意识,是超越于阶级集团中个人观念之上的“群体意识”,就这一点而言,非常类似于涂尔干的超越个体之上的“社会事实”或“集体的意识表象”,它绝不等同于个人思想的集合。

对于卢卡奇高屋建瓴的辩证法论述,后来的研究者却无法将它转化为实证研究的操作概念。因此,在马克思或新马克思主义的流派中,除了上述的历史—辩证方式的阶级意识的论述之外,还有一支是采用基于个体主义心理学方式的阶级意识研究走向。

麦克尔·曼(Michael Mann)在《西方工人阶级的意识与行动》一书中,较早地对阶级意识(其实特指的是工人阶级意识)做出了分类。他认为,发展出成熟的阶级意识包含四个要素,按照发展的顺序是:

- (1)阶级认同(class identity)——作为工人阶级一员的界定,作为和其他生产过程中的工人一样扮演独特角色的界定。
- (2)阶级对抗(class opposition)——要有这样的认识,资本家及其代理人强加给我们长久的敌对。这两个要素是相互辩证的;也就是说,对抗本身强化了认同,而反之亦然。
- (3)阶级总体性(class totality)——对前两项要素的接受就决定了,a)一个人的整体的社会处境,以及b)他所生活于之中的所有社会。
- (4)替代社会——人们伴随着对抗和斗争,

^① “换言之,当资本主义最终的经济危机发展时,革命的命运(以及人类的命运)取决于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成熟,即取决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卢卡奇,1986: 70)。

走向这一目标。真正的革命意识是这4项的总和,而不能是单独存在的。马克思本人已经为这样的从1到4项的阶级意识的提升提供了理论。当工人将它自身具体的经验和对更为广阔的结构分析关联起来,并进一步和改变结构关联起来时,阶级意识就成长起来(马克思有时说“扩展”)。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主义是唯物主义的理论;生产领域的矛盾和集体力量的成长为工人所体验到,其后他们概括出了社会主义的理论。(Mann, 1973: 13)

曼对于阶级意识的细分对尔后的阶级意识相关的研究起了启迪作用。首先,他的划分有很强的逻辑感,4个方面既相排斥,又有递进的关联,给阶级意识一个系统的概念群,极有利于操作。其实后来的研究者发展出的“阶级认同”、“阶级成员感”等指标,大多吸取了曼的思想。其次,他把阶级意识的解释由马克思—卢卡齐的宏观超验层面,具体化到了个人行动者的层面,并强调结构性的要素要为工人具体体验,才能形成阶级意识。这就为以后的以个人为采集对象的实证研究提供了思路。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使得新马克思主义和新韦伯学派的两个取向的阶级阶层研究,都可以有相近的方法起点。

20世纪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遭到的最大的挫折,可能是下面两件事:全世界无产者联合的革命行动的消亡以及新中产阶级(new middle class)的出现。这就需要重新审读马克思的阶级理论的不足。作为新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研究专家的赖特(E. O. Wright)从理论到具体研究层面,都对马克思的阶级理论作了充分修正。他提出“多重剥削”(multiple exploitation)以扩充马克思原有的资本剥削的单一维度,又提出了“矛盾位置”来重新刻画过去非资即无的两大对立阶级关系。所谓多重剥削,指的是在资本剥削之外,还存在着组织、技能的剥削形式。而矛盾位置则正是由于剥削的维度增加,使得不完全占有某种剥削资本的群体处于既剥削他人又遭剥削的地位(Wright, 1997: 41—72)。比如,工厂的管理者就处于这样的位置,一方面他是工人,因为他也出卖自己于厂主,另一方面,他又是剥削者,因为在组织等级中他行使着支配他人的权力。这样,一个更为精密化的阶级结构—分析框架产生了。

在此基础上,赖特进一步对阶级意识进行了操作化的界定。他认为,“阶级”意识,可以被看作是有着独特阶级内容的意识层面,由此引入了阶级意识的三个主要维度:

1. 对多种选择的知觉。选择就意味着在一组可知觉的多种可选的行动过程中加以挑选。意识的一个重要层面就是对多种存在可能性的主观知觉。这样说,阶级意识也就是卷入于这样一个过程:对于多种可选性的知觉具有阶级内容,并且在后果上意识到阶级的行动。
2. 后果的理论。仅有对多种可能性的知觉还不足以使人们进行选择;人们一定还要认识到行动选择的预期后果是什么。这意味着这一选择涉入了理论。它们应该是实作的理论,而不是抽象的形式化理论;应该有经验常识的特点,而不是阐释性的法则。在这一意义上,阶级意识进入到这样的地步,人们持有的理论塑就了人们关于阶级实践的选择。
3. 偏好。了解了人们知觉到的多种选择范围以及他们对每一选择后果的理论,也还不足以揭示特定的阶级选择;当然,应该了解他们的偏好,那就是他们对那些选择后果的希望的评价。希望,在这里可以表示人们对物质利益的渴望,但这里并不一定要限制这一偏好是自利的或自我中心的估量。在这一意义上,阶级意识涉入了阶级利益的主观独特性。(Wright, 1985: 246—247)

和马克思及其后人的经济结构决定阶级存在乃至阶级意识的视角截然不同是马克斯·韦伯。韦伯对马克思阶级模式的简单化提出了质疑。首先,他认为生产关系并非经济分化的惟一源泉,而且相反,有多种市场关系也可以产生阶级。第二,他反对将阶级狭隘地限定于经济领域,并怀疑经济和社会立场间的任何的关系上的不可避免性,而强调分层的多重基础或维度。韦伯构想出权威等级(authority hierarchies)作为分层的强有力的力量,并引入了地位群体(status group)这一概念和经济的阶级作明确的区分(Weber, 1946)。在这里,阶级成为了一群有相似的经济生活机会(life chance)的人们形成的群体,地位群体则是这些人们认同的社会共同体,通常还有着文化基础(Jackman & Jackman, 1983: 2)。由于韦伯将地位、权力等非经济因素以及社会群体间未必对抗的思想引入阶级分析,这就为多元的社会分层及阶级研究开创了先河。

安东尼·吉登斯对于阶级的观点是, 试图将结构和行动结合起来, 形成阶级的结构化(class structuration)。在他看来, 阶级要转化为社会性的实体, 必须要有共同行为及态度的形态产生, 这也明确了结构化的阶级要有共同的生活机会和生活样式。吉登斯的一个重要的概念贡献, 是对“阶级认识”(class awareness)和“阶级意识”的区分(class consciousness), 以及对阶级意识的水平划分:

一个基本的区分可以从“阶级认识”和“阶级意识”的差别中引申出来。我们可以说, 因为阶级是一个建构化的现象, 所以阶级成员中一定存在一种和共同的生活方式相关联的、共同认识和共同接受的态度与信念。我这里所用的“阶级认识”的概念, 却不涉及这样的认知, 即这些态度和信念标志着特有的阶级凝聚, 或存在着其他不同态度、信念和生活方式的阶级的认识。而我这里用的概念“阶级意识”, 恰恰相反, 则包含了上述两重认识。两者之间的区分是根本性的, 因为阶级认识会采取这样的形式: 否认阶级实体的存在。(Giddens, 1973: 111)

从这一区分的表述, 我们可以领会到阶级结构化的精髓。在吉登斯看来, 阶级认识, 是由于阶级结构存在着客观相同的条件, 阶级成员间存在共同的生活背景 and 选择, 因此, 会自然产生出类同的价值体系和行为方式。但这仅仅是为结构所制约的, 并为共同的生活经历所造就的相似性而已。这并不表示阶级成员有能动的自我群体的认同、有排他的倾向。而阶级意识则必须区分“我们”和“他们”, 有明确的共同体的心理边界。所以阶级意识的产生, 又反过来在心理上重新建构人们对阶级的认知。这样, 阶级就成为了既为结构所建构, 又为阶级意识所另向建构的“建构化”产物。吉登斯还进一步将阶级意识概念化为阶级认同意识(class identity)、阶级冲突意识(class conflict)和革命阶级意识(revolutionary class consciousness)这三个水平的划分(Giddens 1973: 112—113)。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皮埃尔·布迪厄在阶级和阶级意识方面提出的诸种“资本”(capitals)和“惯习”(habitus)的概念。布迪厄阶级理论的主旨是超越狭窄的经济范畴, 揭示阶级斗争的符号和文化维度, 他对阶级划分赖以凭借的“资本”作了细致的划分: 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以上三类资本的特性都是获取社会劳动客观产品的工具。在元理论的意义, 它们构成了社会空间, 除了物质生产和分配的经济领域外, 还将文化和社会关系领域整合进了阶级关系的结构化中。然而, 资本量和结构的配置, 只是在理论上构成了“建构出的阶级”, 这种既定的资本量或结构又如何转换为经验上可观察到的阶级实践呢? 自在阶级如何转为自为阶级呢? 布迪厄引进了“惯习”这一极类似于阶级意识的概念。

惯习是长时间获得的知觉、思考和行动的体系。它将客观条件——如给定的资本量和结构——与具体的个人和集体的实践联系起来。它的基本单元是作为某社会群体或阶级之一员的个人行动者。其确切意义为: 惯习作为一种生成性的规则, 以群体和具有阶级特性的生活方式的更为主观性的空间来调停经济和社会条件的客观空间。它既生成实践, 又支撑使行动者可以用品位来划分既定的客观物和实践的认知架构。(Bourdieu, 1977: Ch. 2)

这里把惯习定义为一种性向(disposition), 这样它就有了心理学意义上的动力性和选择性; 另外它是系统的, 意味着这种性向是跨情境的、稳定持续, 因此具有了惰性和惯性(inertia)。从布迪厄的理论还可看出, 惯习的背后是阶级存在的客观条件(objectively classifiable conditions of existence)。所以基本上构成了存在条件—心理惯习—实践—生活方式这样的因果链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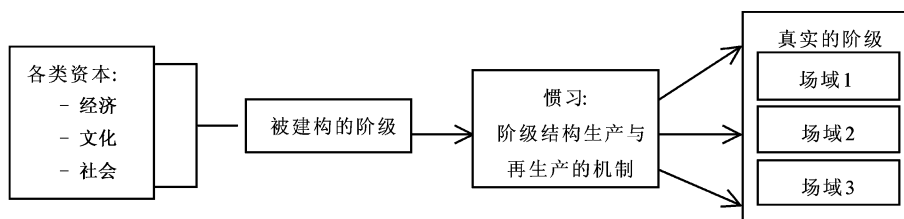


图1 布迪厄资本、惯习与阶段建构的示意图

由上可见, 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冲突理论还是韦伯主义的功能理论, 都关注阶级意识的如下几个层

面:阶级知觉(class perception)阶级认识、阶级认同、阶级冲突以及阶级的变革性。这些层面,也成为诸多有关阶级意识实证研究的操作化起点。

(二)阶级意识的研究操作

尽管在阶级及阶级意识概念、理论上有不同的视角,但在阶级意识研究的操作层面,冲突论和功能论确有许多相近之处,在有关阶级意识的概念细分、题器设定、测量方式等方面皆是如此。

1. 高索普的阶级印象及相关测量指标

英国社会分层及社会流动研究专家高索普是承袭韦伯多元社会分层思想的学者。他对主观阶级层面的研究,既类似于阶级意识,却又不涉及阶级意识与阶级行动的关联。在1962—1963年有关英国工人阶级的调查中,他采用了开放问题的方法,采集被访对象的“阶级印象”(class image)。主要的问题是“人们常常谈论有许多不同的阶级,你的看法呢?”然后根据调查员追问的情况,了解被访问工人:

(1)对阶级的数量的感知;(2)对阶级表述的语汇及分类角度;(3)对决定阶级地位的主要因素 的判定;(4)对自己在社会阶级结构中地位的判定;(5)对个人及群体何以能维持阶级地位 的原因的解释;(6)对向上社会流动的程度的评价;(7)对阶级体系的期望和必需性的观点”等 诸方面的主观感受。(Goldthorpe, 1969:200—201)

可以看出,高索普的阶级印象测量,涉及到阶级的主观认同、阶级差异、社会改变等内容,和阶级意识有共同之处。但由于理论上没有一个明确的阶级意识的概念和框架,题目的设计缺乏整体性。另外由于采用开放式的访问和后编码的处理方法,使得资料数据不够标准化,降低了使用和进一步开发的价值。

2. R. 杰克曼的阶级认识测量指标

杰克曼等利用1975年密西根大学社会调查中心在全美的社会群体意识调查资料,将阶级意识作了如下的设计操作(Jackman & Jackman, 1983:11—67):

(1)阶级认同:人们谈到这样的一些社会阶级,如贫穷者、工人阶级、中间阶级、中上层阶级、上层阶级。你认为自己属于哪一个阶级?(2)职业—阶级地位认识:对于不同社会阶级的人们有属于他们的不同职业这一点,有不一样的看法。这些卡片代表着不同的职业,请把这些职业放置排列到代表上述5个阶级的插槽里。(3)阶级成员标准认识:为了确定有人和你是不是一个阶级,下面这些标准对你来讲有多么重要?他的职业?他的教育程度?他有多少钱?他对事物的看法和信念?他的生活方式?他来自什么样的家庭?(4)阶级凝聚感:这里有5个阶级,请问你感到和它们的亲疏程度如何?^①(5)阶级差异的认识:你认为5个阶级之间有很重要的差异?有比较重要的差异?有不太重要的差异?没什么重要的差异?人们对阶级之间的差异有不同的看法,你同意哪一种?x)大部分的差别是因为生来就不一样;y)大部分的差别是因为生长的家境不同;z)大部分差别是因为在美国的机会不平等。(6)阶级利益的认识:人们对目前美国实行的某些政策和法规对什么人带来好处,对什么人带来伤害,有不同的看法,你认为下面的政策、法规对哪些阶级有利或有伤害?^②

可以看到杰克曼对阶级意识的操作较为细密,但同时也较为繁杂。这些题目间看不出明确的逻辑关系,也形成不了一个综合的阶级意识的测量指标。

3. 赖特的阶级意识测量指标

赖特在他的阶级研究中,将阶级意识作为依存变量(dependent variables)放在检验他所创制的阶级地位框架的效标(test criterion)的重要位置上,使得阶级结构—阶级意识首次成为实证研究中理论假设—检验有机要件。因此,从研究的方法论上来看,赖特是相对成熟的。然而,遗憾的是,虽然在阶级意识的

① 亲近和疏远程度分别用不同的分值表示。

② 具体的题目有:1)对于企业公司的私人产权——而不是政府的所有制,对5个阶级哪个带来利益,哪个带来伤害?2)对某类企业的投资减税,对5个阶级哪个带来利益,哪个带来伤害?

概念分析、理论的操作假设方面甚为精到,但最终阶级意识测量的题目却没有和上位的操作化工作发生对应的关联。在他20世纪80年代进行的美国和瑞典的社会阶级研究的调查中,采用了下面的9个题目作为与阶级意识有关的测量指标:

(1)公司使老板获利,是以工人和消费者为代价的。(2)应该有法律禁止罢工期间管理者雇人来顶替掉罢工者。(3)罢工工人动手不让破坏罢工的人进入工厂开工应该说是正当的。(4)美国的大公司权力太大了。(5)贫困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私有财产和牟利的经济。(6)如果有机会,没有老板,你工作地方的非管理的工人可以办事更有效率。(7)对一个现代社会而言,没有谋利动机社会应运转得更有效率。(8)设想一下一个大行业的工人正在在外面罢工争取好的劳动条件和工资。你希望看到下面哪一桩事件发生?^①(9)你认为自己是否属于某个特定的阶级?如果是,是哪个阶级?如果不清楚,许多人都说自己属于工人阶级、中间阶级或上层阶级。如果一定要作选择的话,你会认为自己属于哪一个?(Wright, 1985: 146—147)

虽然赖特并没有讲明这些指标和阶级意识概念的具体对应,我们还是能略作归纳,这9个题目主要涉及:(1)阶级知觉和认同(题目9);(2)阶级归属(题目8);(3)阶级冲突(题目1、2、3、4、5);(4)阶级替代(题目6、7)。

归纳上述对阶级意识的理念发展和操作化的讨论,可以看出这样的几个倾向:(1)无论阶级分析的冲突论还是功能论者那里,阶级意识或主观阶级问题都是关注的焦点,阶级意识乃是阶级形成的必要条件,已成为共识。(2)受实证研究趋势的影响,宏观分析层面的阶级意识已基本让位于个体角度的、微观的、心理特征的阶级意识分析。(3)和阶级意识的概念分析的详尽相比,阶级意识指标的建立,缺乏明确性和系统性,理论到题目之间,有着明显的断裂。

二、中韩两国阶级意识的比较

(一)研究资料及方法的介绍

对于两国阶级意识的比较,主要根据双方阶级阶层的调查数据资料。中国方面的资料,主要来自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1999—2002年间所进行的“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的调查数据。此次调查采用分层、分域、多阶段混合抽样(multi-stage composed sampling)的方法,共分5级抽样。访问则采用入户面访(face to face interview in house)的方式进行。本文引用的主要是第一阶段4个市县的调查资料以及2001年全国6000样本的调查资料。^②

韩国方面的调查数据,主要来源于韩国出版的各类阶级阶层的调查统计资料和学术著作(参见文后所附参考文献)。

(二)中韩两国阶级阶层结构比较

在对两国阶级意识进行比较之前,先考察一下两国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异同。首先要说明的是,由于两国在社会制度背景上的差异和阶级阶层研究所采用的分类标准不同,数据资料的比较有许多空缺。但是仍然有些固定的指标是可以用来对照的。

从图2和图3两国社会阶级结构分布可以看出,韩国中间阶级在社会结构^③中占主流地位,新、旧中产阶级之和超过了48%,工人阶级次之,近30%。这说明韩国的社会结构已经是一个相当成熟的工业化国家的构造,如果我们把这个结构图形沿轴线翻转一下,就可以得到一标准的“橄榄型”。而中国的

① 答案是:(1)工人赢得了他们最重要的需求;(2)工人的部分需求得到了满足,但也作了些让步;(3)公认的需求只有很少得到了满足,并且作了大的让步;(4)工人们什么也没得到,只好又回去工作了。

② 该调查资料分为三期,第一期为湖北省汉川市、辽宁省海城市、福建省福清市、贵州省镇宁市的调查资料,其中一部分已经发表于《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陆学艺主编,2001)一书中;二期资料为安徽省合肥市、江苏省无锡市、广东省深圳市、北京燕山石化总厂、吉林省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和天津南开大学等市县厂校,目前尚未公布;第三期资料为全国正式调查资料,涉及全国12个省、市、自治区下属的72个市县区的6000份问卷调查。

③ 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分类理论视角的不同,韩国学者的划分法也不尽相同,比较著名的有김영모模型、구해근模型、홍두승模型和서관모模型。出于中韩两国资料比较便利的考虑,本文主要采用分类法和中国相近的홍두승模型。

突出特点是,农民阶级仍然占了44%,工人阶级约占1/4。如果同样沿轴线翻转一下,看到的是典型的“金字塔型”,这说明中国的社会阶级结构正处于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商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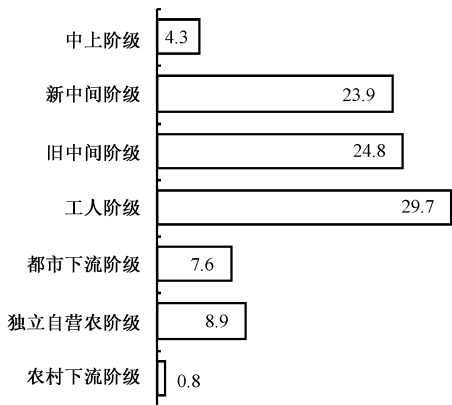


图2. 韩国社会阶级结构分布(2000)

资料来源: Doo-Seung Hong, 2003.

如果把韩中两国的阶级结构分类指标进行相应的统一化,而后进行结构比较,就可以更明显地看到(见图4):

(1)两国之间最大的差距在于旧中间阶级的差距,韩国差不多是中国的6倍!旧中间阶级通常指的是伴随着工业革命和工业化历程的小资者,雇佣较少的劳动或自雇,在中国则相当于个体户、小老板和自由职业者。中国当代的私营、个体自营业者群体出现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表明了原有的“再分配”体制的松动。从跟韩国的比较看,这一阶层还很微弱。

(2)其次的差距在于农民阶级的反差。中国的农民是韩国的4倍多!这体现了中国城乡二元隔绝的社会结构特点。在中国农民向城市的自由流动仍然受着多重限制,城市的户口制、用工制、收容制和农村的土地政策,都妨碍着农业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

(3)新中间阶级也是较大差距所在。新中间阶级多指拥有技能和管理才能但又受雇于人的专业人士,即白领人士阶层。中国有近10%的新中间层(包括专业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而韩国的比例是中国的2.4倍。

(4)中上阶级在韩国指大资本家、政府高官、大企业的高级管理者、高级专业人士(高级法官、检察官、律师、医生、著名学者等),在中国则主要是政府官员和公有制大型企业的负责人。两国比例看似接近,实际上由于两国制度对政治权力和财富权的偏向不同,中上层内部的构造是不相同的。在中国,政府领域(行政高官)和经济领域(大企业管理者)间的力量比例是1.4:1;而在韩国,资本家则占了这一阶层的60%左右。

(三)中韩两国阶级意识比较

根据前述曼和吉登斯对阶级意识的层面划分,中韩两国阶级意识的比较可从“知觉层面”、“关系层面”、“实现层面”三个方面来进行——这一思路也是韩国学者所常用的(양준, 2001: 155)。但由于双方资料不匹配带来的缺憾,这里我们只能对阶级意识的前两个方面加以对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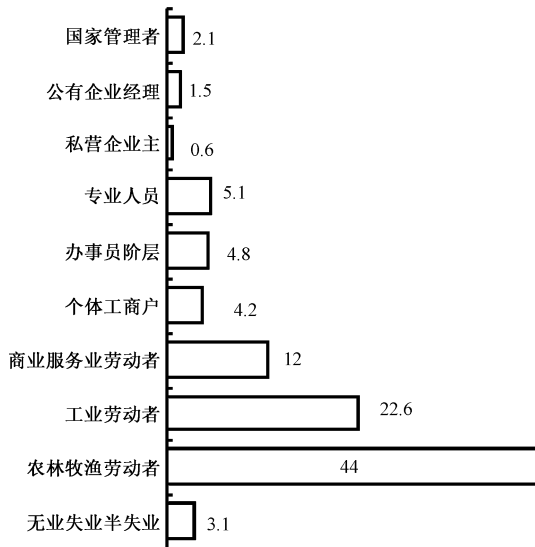


图3. 中国社会阶级结构分布(1999)

资料来源: 陆学艺主编, 20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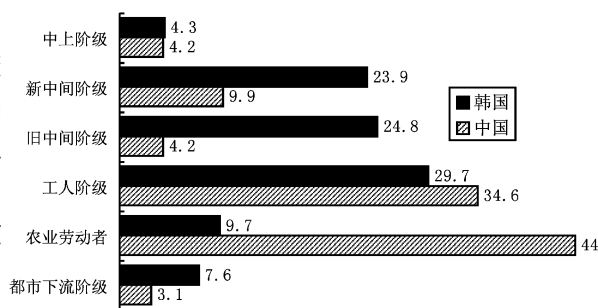


图4. 中韩两国社会阶级结构比较

资料来源: 同图3.

1. 知觉层面

所谓知觉层面的阶级意识,主要是对自身的社会经济地位的归属的表述,通常被看作是阶级阶层意识的基本形态。这一意识表露了对自我阶级的认同,对社会地位等级不平等的事实的确证。

在中国的研究中,我们首先了解的是民众对于阶级这一概念的认识(cognition)和阶级的划分标准。阶级这一概念在中国基本上是由精英向民间传递的,20世纪初期自俄国传入中国,在共产党执政后,又依靠集权的意识形态,成为统治话语中的核心概念,但也渐渐失去了马克思建立在生产关系上的阶级概念的原意。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中国主流意识形态赋予阶级这一概念为与阶级斗争和专政相关联的身份类型。但1978年后,开始走向市场化的官方意识形态,又宣布阶级斗争已不存在。因此有必要考察民众对于这一灌输来的理念究竟如何看待。调查中首先询问“你是否认为当前的中国社会存在阶级?”中国汉川的调查结果表明(见图5),总体上看,社会的阶级存在意识还是比较低的,只有51.6%的被调查者认为中国存在社会阶级,有48.4%的人或认为我国不存在社会阶级(18.5%),或说不清楚(26.6%),或干脆不回答问题。辽宁海城的调查也表明了同样的特征。

是不是中国民众真的没有知觉到社会的不平等分化?后面的分析证明并非如此,绝大多数民众对当前中国社会群体地位分化和不平等有强烈的态度。那么为什么有如此之高比例的民众不承认或不明确阶级的存在?可能的解释是,“阶级”这一语汇在中国有很高的政治敏感度。一部分人是将阶级和“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政治运动”联系起来的,认为中国目前不存在(也不希望存在)那样的阶级斗争;还有的人出于强调稳定,回避贫富分化的“政权思维”,而否认阶级的存在;如果这样的猜测成立的话,也恰恰说明,原有的、政府传导的阶级理念框架,无法适宜地表达人们对现实社会阶级分化的感知。

下面这段调查中对声称不清楚是否存在阶级的被访对象的访谈纪录,便表明了这样的状态:

“你叫我怎么分类,不好分,有什么标准。职业那么多,怎么分呢?大概齐?也不容易。粗略地分一下,可以分为吃皇粮的和不吃皇粮的,吃皇粮的有领导干部、一般干部,不吃皇粮的有雇工和老板。我还有一种按户口的分法,那就是三代北京人、两代北京人、一代北京人和外地进入北京的人。三代北京人就是他们的爷爷奶奶、父母和他们自己都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两代北京人就是父母和自己都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一代北京人就是自己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父母不是。最有出息的是外地进京的北京人,最其次是一代北京人,其他都是没有出息的北京人,他们只要嘴皮,不干实事,更干不了大事的人。按收入来看,最高的是承包商和国有企业老板,中国是个官本位的社会,赚钱都要与官结合起来,才赚得多,然后就是证券商、广告商、广告人,像我们也是比较能赚钱的,当然要运气好,最差的是清洁工人,比下岗工人还惨。论地位讲,最高的就是大官,部长级以上官员,再就是大老板,这个社会,有钱就是有地位,钱是一个人的价值体现,也许用成功来表达比较好,所谓成功者,就是在经济上赚钱,或者职务得到提升。”(本课题组北京地区调查访谈)

从这段话中可以归纳出这样几条信息:(1)被访人承认存在着社会不平等现象;(2)她所使用的分类角度,或者说她所知觉到的群体差别维度,突出的是官与民(吃皇粮与否)和城与乡(户口划分)的不平等。这其实正是中国当今社会阶级结构的基本划分点。(3)这种感知和区分,是传统的阶级框架所不曾容纳的——在计划体制下,官方所认可的中国社会阶级构造是“两个阶级、一个阶层”^①,其中干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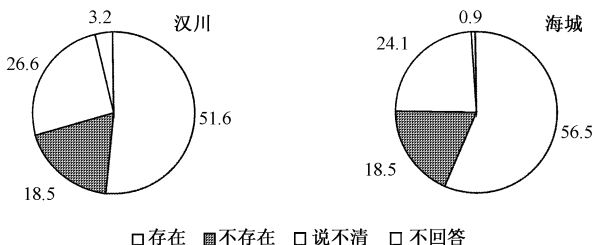


图5. 中国民众的阶级存在意识——
您是否认为当前的中国社会存在阶级?(%)

① 指工人和农民两大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

“官”) 在理论上属于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不存在和群众的利益对立, 实际上是 47 年前吉拉斯的“新阶级”所指出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官员作为一个新兴的权力把持者和普通民众的对立(Djilas, 1957: 38)。

对韩国而言, 阶级的存在是不言而喻的, 它没有中国那样的将阶级理念既崇尚化又禁忌化的历史。因此在韩国的调查资料中, 也没有出现过询问是否存在阶级的问题。

阶级意识的知觉层面的另一个考察, 便是主观的阶级认同(class identity)和归属这个被吉登斯称为阶级意识最初等的基础。在韩国和中国的调查中, 都询问了“如果把入划分为上中下不同的等级, 你自认为属于哪一等”这一类的问题。

韩国的资料表明, 首先, 韩国的民众有较强的中等阶层的阶级认同意识。在 20 世纪 60 年代的调查中, 就有 61.6% 的民众认为自己属于社会中层。从 60 年代—80 年代长时段的发展趋势看(表 2), 认定自己是中间层的(中上、中中、中下)比例, 在 47—64% 之间^①。中央日报 1995 年的调查统计也表明, 1985 年阶层归属意识调查中, 下流占 39.8%, 中流 57.7%, 上流 2.5%; 1995 年下流占 13.3%, 中流 78.4%, 上流 8.3%, 10 年间有了明显提高。也就是说, 有 91.7% 的应答者自认为是中流及以上。^②

表 1 20 世纪 60 年代韩国阶层结构及归属意识 (%)

阶层认同 所属等级	上	中上	中下	下	合计	人数
上	5.7	60.4	30.2	3.7	100	53
中上	3	38.9	46	12.1	100	198
中下	1.9	19.8	43.8	34.5	100	258
下	—	4.8	24.3	70.9	100	206
合计	1.9	23.8	37.8	36.5	100	715

资料来源: 김영모 1969: 15

表 2 20 世纪 60 年代—80 年代韩国对中间层归属意识的研究

调查实施年度	调查地区	中间层认同			
		中上	中中	中下	合计
1962 年	汉城、大邱、全州	12.5 (14.3)		35.4 (33.7)	47.9 (48)
1964 年	汉城	29.1		34.3	63.4
1968 年	汉城	23.8		37.8	61.6
1976 年	汉城	14.6		35.1	49.7*
1977 年	汉城、釜山	10.5	30.7	21.7	62.9
	光州、天安	(10)	(31.5)	(20.3)	(61.8)
1979 年	全国	14.8		32.4	47.2**
		(22.5)		(41.4)	(63.9)
1981 年	全国	26.9		36.5	63.4

* 如果按各阶层人口构成调整 应为 44.6%; ** 若按全国职业构成推算应为 40.2%。

资料来源: 김석춘, 1992: 25.

还可以从中间阶级的等级归属上发现这一特征。表 3 资料表明, 20 世纪 90 年代全部被调查的中间阶级人员中(主要包含小资者、旧中间阶级和新中间阶级), 68% 的人都将自己归属于中间层, 加上 6.7% 的中上层比例, 则中层认同者共有 74.7%。这也反映了韩国社会较高的中间层归属意识。通过分

① 大部分调查研究来自于包括了汉城在内的都市地区, 因此并不能简单由此推断全国。如果限定在首都圈内, 大体上 60% 的应答者都归属于中间阶层。当然每个调查研究的阶层等级划分多少不一, 少的有 4 个, 多的有 9 个, 但中间阶层的归属倾向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这里中间层归属倾向和中间阶级归属意识要有所区分。即按阶级分为资本家阶级、中产阶级、工人阶级, 那么有 42.1% 的应答者属于中产阶级, 54.5% 属于劳动者阶级。这样按全国推算, 有 34.4% 的国民为中产阶级, 64.1% 是劳动者。然后从地区看, 汉城有 55% 的中产阶级, 其他城市地区只有 44%。农村地区则只有 15% 的应答者为中产阶级。详见 양춘, 2001: 158.

② 详见韩国《中央日报》(중앙일보), 1995 年 9 月 22 日。

类的中间层归属的考察来看,那些从事体力劳作和生产性劳作的劳动者(划分1和划分2中)大多数将自己归属为下层(分别为49.3%和53%),而具有“新中间阶级”特征者(分类5中专业资格获得者、分类4中的专业管理者、分类3中的监督者)不但中间地位归属最高,而且整体的归属都较为向上。这种归属意识和教育及学历变量有着深度的关联。

表3 韩国中间层中不同阶级地位的主观阶层归属意识 (%)

地位	归属	上层	中上层	中间层	下层	不知道归属	合计
小资产阶级		1.4	8.2	73.9	15.5	1	100
划分1	非体力	0.9	7.8	71.9	17.7	1.7	100
	体力	—	1.4	47.9	49.3	1.4	100
划分2	非生产	0.8	7	69.6	20.9	1.7	100
	生产	—	1.2	44.6	53	1.2	100
划分3	监督	1.2	9.8	71.3	14.6	3	100
	非监督	0.5	4.7	63.7	30.1	1	100
划分4	专业管理者	1.7	12.2	71.1	13.3	1.7	100
	日常雇员	0.3	3.4	63.5	31.3	1.6	100
划分5	资格获得	0.9	11.6	77.3	9.7	0.5	100
	未获得资格	0.6	2.9	58.9	35.4	2.3	100
调查对象总体		0.9	6.7	68	22.9	1.4	100

资料来源: 김석준, 1992: 191.

其次, 尽管韩国社会成员普遍有中间层归属倾向, 但客观的阶级位置和主观的阶级认同之间, 有着共同的对应趋势。也就是说, 客观阶级地位的分化在主观认同上可以找得到确认。从表1可以明显看出, 随着个人所属地位的从高到低的变化, 阶级认同中, 归属中上层的比例依次递减, 而归属于下层的比例依次递增。从阶级划分的角度, 也依然可以看出依资产阶级—中间阶级—无产阶级的顺序, 主观的等级归属也在下降(见表4), 也体现了客观阶级与主观阶级归属大致对应的特征。值得注意的是新中间阶级自我认知的地位, 要高于旧中产阶级。

表4 20世纪60年代韩国阶级与阶层意识 (%)

阶层认同 所属等级	上	中上	中下	下	合计	人数
资产阶级	0	69.2	30.8	0	100	13
旧中间阶级	1.8	25.7	37.9	34.6	100	269
新中间阶级	2.3	29.3	46.5	21.9	100	215
无产阶级	2.02	11.1	29.3	57.6	100	198
其他	0.0	35.0	30.0	35.0	100	20
合计	1.9	23.8	37.8	36.5	100	715

资料来源: 임영모, 1969: 15.

中国的阶级意识认同与归属和韩国有所不同。根据1999—2000年汉川、深圳、合肥三地的调查资料, (1)中国的阶级等级认同有明显的趋中倾向。这一比例在汉川是54.1%, 在合肥是84.3%, 在深圳是75.3%。也就是说, 在客观阶级地位上不平等的各群体, 依然把自己看作是“中间等级”。客观阶级地位最高的“国家级社会管理者”(即官员)和“经理”(即公有制企业的负责人)在汉川、深圳和合肥把自己归属为中层的社会等级的比例都是最高的。(2)作为资产阶级的私营业主, 对自身地位的认同随地区

的差别而有所不同。在汉川,这一群体中的60%把自己看作是中下层;而在合肥,都集中在中上层和中层;在深圳,除大部分(60%)认为自己属于中层、中上层外,已有10.7%的资本家把自己看作是上层。这表明随着地区的市场经济发展程度不同,地方社会对原属异己的“剥削阶级”的宽容度不同。(3)作为社会中间阶级的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和个体户(小资者),他们的中间层认同是最为明确的。同时也明显看出,旧中间阶级的小资者——即个体户——的主观地位等级认同就低于新中间阶级(专业人员和办事人员),这一点和韩国是较为一致的。(4)广义上的工人阶级(包括产业工人和商业服务业工人)并不把自己看作是社会底层,其集中的定位是中层偏下。职业人口中,惟有农民阶级自认为是社会的下层。

表5 汉川、深圳、合肥阶级结构与主观阶级认同 (%)

阶层认同 所属等级	汉川					深圳					合肥				
	上层	中上层	中层	中下层	下层	上层	中上层	中层	中下层	下层	上层	中上层	中层	中下层	下层
国家及社会管理者	8.3	16.7	50.0	16.7	8.3	0.0	40.0	40.0	20.0	0.0	2.5	17.3	48.2	29.6	2.5
经理	0	3.4	46.6	25.0	21.6	3.6	14.3	57.1	14.3	5.4	2.9	2.9	64.7	23.5	0
私营业主	0	0	17.2	59.2	6.4	10.7	32.1	28.6	14.3	7.1	0	50.0	50.0	0	0
专业技术人员	1.5	3.0	46.3	37.0	4.4	6.4	24.6	42.9	14.3	3.9	0	12.7	66.5	17.5	2.4
办事人员	2.3	6.2	41.3	22.5	13.9	5.6	13.9	44.7	14.7	13.3	0	8.0	54.3	25.9	8.6
个体户	2.4	2.6	37.6	26.0	25.8	1.9	11.8	39.2	23.5	15.7	0.9	2.8	48.1	24.5	21.7
商业服务业劳动者	0	0	25.2	37.8	22.7	0.9	8.5	33.0	24.5	25.5	1.8	1.8	54.4	21.9	16.2
工人	1.7	2.1	33.4	27.1	22.4	0.00	8.3	38.9	16.6	27.8	0.6	3.8	47.9	24.8	18.8
农民	0.3	1.7	28.5	17.4	39.7	—	—	—	—	—	—	—	—	—	—
待业失业半失业者	0.5	1.4	29.8	12.1	30.6	3.1	15.5	41.1	20.0	14.6	1.8	6.8	50.1	26.5	12.1

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1999年社会阶层调查。

2. 关系层面

阶级意识的关系层面是指具有自我阶级认同的行为者对他所属于的集体的属性的认识和表达的程度。通常用社会距离(social distances)、生活机会、生活样式类同性、共同地位群体化、同流意识、群体亲近感等作为测量指标。正如汤普森所言:当具有共同经验(无论是继承的还是共享的)的人们,感受到并表达他们之间利益的认同,以及感受到并表达与那些与他们利益相异(通常是相对抗)的人们的差异,这时阶级就产生了(Thompson, 1963: 9)。

韩国阶级意识关系层面的测量,主要采用了职业社会距离测量(sociometry)和生活样式类同的方法。社会距离测量法,主要是询问被访人感觉到与哪个群体更接近。

在1988年的研究中,用8个职业——生产工人、出租司机、自营业者、公司事务员、一般公务员、高级公务员、公司老总、大学教授——分别代表了下、中下、中、中上、上5个等级的社会阶层,并请被访人对这8个职业和自己的距离打分。分数越高表示距离越远,反之则越近。

正如表6所显示的,工人阶级对下层等级职业的生产工人和出租司机的距离感是最近的,旧中间阶级则最为靠近自营业者,新中间阶级对公司事务员和一般公务员的距离感最小,大学教授、公司老总、高级公务员则和中上层的心理距离最短。这一心理距离测量的结果也同样证明了韩国社会成员的客观地位和主观阶层感知之间有高度的对应。在这样的阶级印象下,自营业者对应于旧中间阶级,生产工人和出租司机对应劳动阶级;公司老总 and 高级公务员则对应资本家阶级。这一研究还发现,和资本家阶级相比,旧、新中间阶级相对与工人阶级的距离更近一些。

韩国学者认为,这一方面是因为韩国人传统思维中固有的平民意识,一方面是因为中间阶级成员的父母大部分具有农村社会的背景,因而对下层产生了伦理的亲切感,这一观点甚至隐含着这两大阶级社

会运动方面协作的可能性(양준, 2001: 164)。

表 6 韩国不同社会阶级的职业距离感的分数分布及显著度^①

社会阶级	评价的职业							
	生产工人	出租司机	自营业者	公司 事务员	一般 公务员	高级 公务员	公司老总	大学教授
工人阶级	3.75	4.3	4.5	4.41	4.77	5.95	5.61	4.91
旧中间阶级	4.20	4.53	4.03	4.46	5.01	5.86	5.35	4.95
新中间阶级	4.34	4.9	4.72	4.01	4.41	5.56	5.46	4.59
中上阶级	4.61	4.95	4.82	4.17	4.94	5.01	5.00	3.63
平均	4.15	4.64	4.55	4.24	4.69	5.67	5.43	4.64
显著度	0.01	0.01	0.01	0.01	0.1	0.01	N.S	0.01

资料来源: 나간채, 1988: 63.

表 7 韩国不同主观阶层对职业的距离感分布及显著度

主观阶层	评价的职业							
	生产工人	出租司机	自营业者	公司 事务员	一般 公务员	高级 公务员	公司老总	大学教授
上层	4.33	5.39	4.4	3.78	4.47	5.28	4.15	3.76
中上层	4.33	4.88	4.68	4.27	4.79	5.39	5.19	4.19
中下层	4.12	4.63	4.48	4.17	4.72	5.76	5.61	4.75
下层	3.94	4.24	4.56	4.45	4.51	6.3	5.48	5.12
平均	4.15	4.65	4.54	4.24	4.7	5.69	5.44	4.64
显著度	N.S	0.01	N.S	N.S	N.S	0.1	0.01	0.01

资料来源: 나간채, 1988: 66.

职业间的社会距离感的等级性变化还可以从被访人的主观阶层差异上来分析。表 7 表明, 下层群体, 对生产工人和出租司机职业的距离感分数是最低的, 而随着阶层的上升, 距离感也相应加大。截然相反的是, 上层人士对高级公务员、公司老板和大学教授职业的心理距离最近, 而随着阶层向下, 主观距离感也大体随之加大。然而, 对自营业者、公司事务员和一般公务员这三个归属于中间层的职业, 各阶层对他们的距离感却没有什麼差异。这一结果说明, 处于阶层序列两端的职业, 更容易引起阶层间的距离敏感, 而中间地位的职业差异却未被确认。

中国各阶层间对职业的社会距离感的测量采用职业声望测评的方式, 共有 80 种职业为被访人排序^②。为了便于和韩国比较, 从中抽出了相对应的 8 个职业。^③ 其中农民这一职业为韩国所无, 但在中国, 农民是惟一既被人又被自身认定为下层阶层的群体, 因而具有比较的标杆作用。分析结果从总体来看, 比韩国的社会成员更具有区分度, 所有的评价结果在主观阶层上都有明显的差异(见表 8)。具体看来, 自认为上等阶层的人和大学教授职业的心理距离是最近的, 其次相近的是高等公务员, 而和农民、自营业者的距离最远。自认为中上阶层的人心理上最接近一般公务员、私企老板、大学教授, 而和农民、生产工人的距离最远。中间等级的社会成员主要认同的是出租司机, 向上和高等公务员、大学教授的距离最大, 向下和农民的差距最明显。中下等级的被访人和生产工人、自营业者(个体户)的心理距离最近,

① 除了对公司老总的距离感外, 其他各阶级间的差异都在统计上有显著性。

② 职业声望测量的设计和社会距离测量并不相同, 但可利用其结果转化为社会距离感的分数。其原理是|个人社会地位等级评价分数-评价的职业社会地位等级分数|=社会距离感。由于个人社会地位等级评价分数和对职业的社会地位等级的评价, 都是主观心理感受, 因此上述的转化和韩国学者所采用的自认与哪一个职业的距离近的测量方法逻辑上是一致的。

③ 8 个职业中自营业者是个体户, 一般公务员是政府机关办事人员, 高等公务员是市/县领导干部, 私企老板原来叫私营业主。为了和韩国比较, 采用了将这些中国的职业名称与韩国对应化的方法。

其次为农民,而和高级公务员、大学教授的距离最大。最后,下层群体明显地独指农民,而同样和高等公务员、大学教授的地位疏远。

表 8 中国不同主观阶层对职业的距离感分布及显著度

主观阶层	评价的职业							
	农民	出租司机	生产工人	自营业者	一般 公务员	高等 公务员	民企老板	大学教授
上	3.467	2.760	2.800	3.158	1.422	1.280	2.000	0.640
中上	2.278	1.388	1.761	1.852	0.238	0.486	0.347	0.351
中	1.354	0.583	0.777	0.816	0.788	1.511	0.778	1.410
中下	0.444	0.597	0.293	0.298	1.658	2.559	1.517	2.355
下	0.910	1.589	1.582	1.348	2.804	3.758	2.789	3.213
显著度	< 0.01	< 0.01	< 0.01	< 0.01	< 0.01	< 0.01	< 0.01	< 0.01

资料来源:同表 5(尚未发表)。

和韩国社会成员阶级意识中的社会距离感相比,这里有几个有趣的发现:

(1)中国农民是一个社会最底层的群体,远远地疏离于城市的社会等级之外,使得城市的阶层由此参照系而提升了自己的主观地位。特别是社会地位上与之相邻近的工人阶级,其地位归属和主观心理距离,都偏向定位中下层,而不是像韩国的同伴处于社会底层空间。而韩国的农村社会由独立自营农和农村下层(雇农)组成,其中前者的数量是后者的2倍(见안치민, 홍두승, 1995)。无论按照홍두승模型,还是서관모模型,独立自营农或农、渔民阶层的地位都应该类似于小资产者或半无产者,居于工人阶级之上,或起码不低于工人阶级。中韩两国间的这一社会结构的差别,反映在阶级地位心理上便是工农阶级的社会地位的感知差异。

(2)自营业者(个体户)在韩国归属于旧中间阶级或小资产阶级,而在中国则地位低下类同于生产工人。这和原有公有体制的单位制下的职业价值不无关系。在中国,一方面私营的盈利机构仍然受到社会偏见的贬抑,另一方面小手工、小家庭方式的谋生方式一定程度上不被人们看作是职业序列,似乎在那些有着领导,有着科层,有着传达室的组织上班,才能叫工作。在我们的调查访问中,有不少个体或家庭经营者不认为自己“有工作”,原因大概便在于此。

(3)中国一般公务员(调查中原本的称呼为政府机关办事人员)的地位感知更靠近中上层,尤其是下层成员在心理上远离这一职业。这和韩国各阶层对一般公务员无差异的心理距离现象形成了很大的反差。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社会政府的集权体制和官本位文化的特征。

(4)私营企业老板在中国的地位既非上层,当然更不是下层,而是处于中上层的心理地位。这和韩国的同类项“公司老总”的上流社会地位相比要逊色不少。此乃私营企业家在中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属于另类的缘故。

三、结论与讨论

根据以上的资料比较,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得出以下结论:

(一)中韩两国阶级阶层结构与阶级意识的差异

1. 与中国相比,当今韩国的社会结构更贴近现代工商社会,这主要表现在近半数的人口为社会中间层;而中国依然是一个农业人口为主的工业化国家。这说明韩国已经完成了走向工业社会的转型,而中国尚在工业化过程中。这种社会结构在转型时序上的差异,是中韩两国阶级阶层结构的基本约束。

2. 两国的社会成员对于各自的社会阶层都有着明确的等级化的感受,但是韩国民众的客观阶层与自我主观阶层间的认同较为一致,而中国民众则存在着客观等级与主观地位知觉错位的现象。主要体现在私营企业主、自营业者都有着对自身评价偏低的倾向。这一现象源于中国在政治与意识形态方面

对非公有制经济及社会力量的歧视。

3. 较为类似的是,两国的社会成员都同样有70%以上自认归属于“社会中间阶层”,但在韩国,这一中间层认同是以占人口总数近一半的小资产阶级和新中产阶级为基础,而在中国则是上、中、下各个客观存在的阶层在主观上中层化造成的。主要表现在城市工人阶级与商业服务业工人主观阶层地位的中层化,即并不将自己定位于底层,而更多是中层、中下层。这一现象恐怕要归因于中国的城乡二元体制所造就的社会比较的参照体系。

4. 中国的社会成员对于社会阶层不平等化的感知,还缺乏一个共同的表达语汇,也就缺乏一种构建心理共同体(psychological community)的沟通要件。放弃了马克思意义上的阶级概念后,尚没有相应的新的官方主流的概念框架和话语。社会学家对于当代社会阶层结构加以阐释的图式,能否反过来建构社会?

(二)中韩两国现代化进程上的路径差异

我们再回到历史宏观层面来考察两个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上的路径差异,以理解各自阶级形成和阶级意识的独特性。

1. 韩国现代化进程的特征

在封建时代,中韩两国有着类似的社会阶级结构、统治体制和文化价值体系,也在大致相当的时代范围内同样受到西方强国的“挑战”,也都因为外战和内战,中断了现代化的进程。到20世纪40年代末中韩两国完成了民族国家的独立事业之后,工业化的现代化目标得以再度确认,然而不同的社会制度的选择造就了双方不同的社会阶级结构。

韩国40年来的现代化过程,其基本的制度走向可以看作是资本主义的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但它追随的并非英美模式,而是更多地采用国家导引企业、权力集中政府的普鲁士道路,即“指导的资本主义”(guide capitalism)。在发展战略上,力主推动现代化运动的朴正熙政府,采取了出口导向的产业化政策,开启了韩国急速的工业化过程。而这一过程本身,直接影响到韩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形成。

韩国的上流资本家阶级——“财阀”阶层——即是政府扶植的产物。为了开拓外向型经济,韩国政府扮演着企业家的角色,直接经营企业并指导私营企业,为它提供信息、技术、资金,充分发挥私营企业的积极性、创造性,开拓和利用市场的力量。朴正熙政府动用了整个政治和行政的力量推动出口繁荣。总统朴正熙不仅每月召开出口会议,还不断强调不允许为出口生产设置任何行政障碍,并减化各种行政管理的和程序的规则、手续,以有利出口业务的开展。政府为帮助生产厂家出口而提供资金技术、信息服务和安全保障,甚至全部在国外的工作人员包括驻各国大使,都纳入推动出口繁荣的服务行列之中。在具体的财政政策上,1962—1979年之间,国民总产值的3—10%都作为利息津贴补贴给了私营企业。因此,在朴正熙时期,私营企业一方面得到政府的扶植,另一方面在生产经营上享受到莫大的自由。资本家阶级的上流地位就是这样塑就的(尹保云,1995:176—190)。

而工人阶级则来自自由产业结构的急速变化而卷入的大规模的农民阶级。据统计,1962—1992年30年间,韩国农业占GNP的份额从40%降至9%,农业就业人口自80%降至18%,产业转型的这个数字在欧洲国家是经历了1个世纪才达到的。到1984年,有1100万农民从土地上转移出来,年流出率为4.7%(Koo,2001:33)。大量的企业及其工人在空间上密集于几个工业中心,集中的工人社区为工人阶级的形成提供了条件。为了吸引国外投资和增加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朴正熙政府一直对工人采取低工资的分配政策,并通过各种法令控制劳工队伍政治化(尹保云,1995:200),也造就了工人阶级的底层地位。

韩国的强劲的社会运动也为社会阶级的形成,特别是工人阶级由自在阶级转化为自为阶级提供了锻炼空间。20世纪70—80年代末社会和民众运动大量出现,教会组织首先介入工人运动,引导和庇护工人运动分子,并组织夜校和小规模的集体活动,使工人分享经验建立认同和团结意识。80年代早期学生群体开始进入工人运动,他们深入到工人中,有些并成为工人之一分子,帮助组建独立的工会,传播

民主、分配正义、民族文化认同等理念,提升了工人的阶级意识、政治意识和阶层的社会角色感(Koo, 2001: 69—153)。我们可以看到韩国70年代初到90年代初工人阶级发起的高密度的罢工、游行、示威运动,这是他们对阶级的底层化处境的不满和对自身集体行动力量觉悟的表现。

2. 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特征

中国在1949年缔造中华人民共和国,50年代就开始了“急风暴雨”般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建立了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实际大部分为国有制)、经济活动的中央计划体制。旧有的社会阶级也为土改、合作化、资本国有化、镇压反革命等一系列社会和政治运动所摧毁,到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只剩下“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阶层)。为了赶超西方先进国家,中国采用的是“非市场化的工业化”策略,在公有制和计划体制的框架中构建了城乡二元体制,利用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来进行现代化的原始积累,即所谓“农业支援工业,农村保障城市”的经济战略指导方针。因此农民被固着在土地上,被迫向城市提供廉价农产品,没有迁徙和择业的自由^①;而城市居民及工人则享受公有制的各项福利和补贴。在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工农联盟”实际是不存在的,工农关系很大程度上成为了城乡对立关系、身份歧视关系。这便是中国农民阶级底层化、工人阶级中间化的主观感受的制度背景。

自1978年以来,中国开始了市场化导向的改革,“再分配经济”模式松动,个体经营者(相当于韩国所称的“旧中间阶级”)开始在农村和城市政府管制的边缘地带出现,并逐步壮大。^②从他们中间又产生了“私营企业主”^③,到2000年已有近400万人,176万家企业。这两个有着密切血缘关系的阶层,是中国经济转型期中最先受益的群体,也是市场化最有力的推动者。然而由于都姓“私”、姓“资”,在意识形态仍然政治化的中国,必然处在经济资源优势和政治/权力资源劣势的不平衡境遇中。这就是他们在阶级主观定位上得到低评,同时也低评自己的缘由。对他们而言,“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写入宪法,才是最大的安全和平等。

“中产阶级”、“新中产阶级”对中国人来讲还是一个较为新颖的概念,与其相对应的社会群体也是一个崭新的阶层,但其来源却有旧与新两类。一类是旧有的公有制体制下的各类机构的底层“干部”(相当于事务员、一般公务员)和知识分子、各类专业技术人员;一类是随着开放政策涌入国内的外资、港澳台资企业中的中方“白领”雇员。这一阶层最为目前的社会学家所关注,但他们还很微弱,总体上占职业人口的10%。在外资企业的白领通常有着较好的教育背景、丰厚的工薪、时尚的生活方式,所以心理定位于中上层;而事务员、公务员阶层多在公有体制的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内,工作稳定、接近权力、上升机遇多,也偏重于认同中上层。^④所以这一“新中间阶级”总体是自视为中上流的社会群体。

然而25年前还处于“中间层”的公有企业的工人(这里是广义的工人,包括商业服务业员工)随着市场化和社会资源的重新分割,逐渐滑向下层。根据有关的研究,当前不同所有制企业下的工人在逐渐趋同、逐渐结晶化。依靠他们目前所拥有的资源和在市场中的地位,很难储蓄到上行流动的资源(石秀印, 2001: 133—140)。因此,工人阶级反而有望在境遇下落的时候产生出他们的集体意识。

3. 对中韩两国社会阶级阶层的阶级意识、阶级形成背景的分析 and 回顾,启示我们:采用“赶超战略”的后发现代化国家,社会阶级的产生、其社会阶级结构的变迁,很大程度上和作为社会发展主导力量的政府所选择的制度安排、战略策略有极大的关联。急速的工业化、现代化政策,往往带来社会阶层集中化的产生或消亡。这为阶级形成提供了客观的环境,同时也加剧了社会阶层间的冲突。至于诸社会阶

① 中国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是对农民阶级身份的最大约束。这一制度发源于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1956年1月13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农村户口登记、统计工作和户籍工作移交公安部门接办的通知》,依据这份通知,农村户口的登记、统计工作由内务部和各级民政部门移交公安部和各级公安部门接管办理,由此便人为地给其涂上专政机器的强制色彩。紧接着于1958年1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经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91次会议审议通过,由国家主席毛泽东以“共和国主席令”的形式颁布施行。此条例对农民进入城镇作出了约束性限制:“公民由农村迁往城市,必须持有城市劳动部门的录用证明、学校的录取证明或者城市户口登记机关的准予迁入的证明,向常住地户口登记机关申请办理迁出手续”。

② 1978年中国的个体户为15万户,2000年已增加到2571万户,22年时间增长了170倍。

③ 按照中国工商管理部门的规定,雇工8人以上者为私营企业,8人以下者为个体工商户。

④ 中国目前的事务人员还主要集中在公有体制内的行政机构、事业单位和企业。私营企业中的此类人员比例甚少,目前私营企业平均规模不超过14人,还远没有达到科层化的状况。

级能否由自在状态转化到自为状态,取决于是否有集体行动的空间以塑就其共同体概念,取决于是否有明确的阶级成员意识。而这两者,又都依赖于客观存在的阶级是否有组织化的资源以达成集体行动,依赖于是否有阶级理念传播的机制和代理者(institute and agent)。

参考文献:

卢卡奇, 1986《历史与阶级意识》, 华夏出版社。

陆学艺主编, 2001,《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马克思、恩格斯, 199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人民出版社。

石秀印, 2001,《当代中国的工人阶层》, 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韦伯, M., 1993,《儒教与道教》, 江苏人民出版社。

尹保云, 1995《韩国的现代化》, 东方出版社。

김석준, 1992, “한국중간층의 계급 위치와 계급 성격—도시 임금취득자를 대상으로”, 고려대학교 대학원 사회학과 박사학위논문.

김영모, 1969, “서울시의 사회계층과 계급구조 관한 연구”, <김재원 박사 회갑 기념논총>

나간채, 1988, “직업계층간의 사회적 거리감에 관한 연구”, 고려대학교 사회학과 박사학위논문.

신행철, 1999, <한국사회의 계급연구홍두승>, 아르케.

안치미·홍두승, 1995, “해방 50년 한국사회의 계층구조와 변화”, <해방후 한국 사회의 구조적 변동과 사회발전—광복 50주년 기념 학술대회 발표 논문집>, 한국사회사학회. 한국사회학회.

양춘, 2001, <현대 한국사회의 계층구조>, 집문당.

중앙일보, 1995년 9월 22일.

홍두승, 1982, <경제발전과 사회계층 관한 연구>, 한국사회과학연구협의회.

Bourdieu, Pierre 1977,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84 *Distinc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Djilas, M. 1957, *The New Class*, Frederick A. Praeger, Publisher, New York.

Giddens A. 1973 *The Class Structure of The Advanced Societies*, London, Hutchinson & Co. (Publishers) Ltd.

Goldthorpe, John H. 1969 *The Affluent Worker in The Class Structur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ong, Doo-Seung 2003, *Social Change and Stratificati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Netherlands.

Jackman, M. R. & Jackman, R. W. 1983 *Class Awareness in the United Stat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ley and Los Angeles California.

Joppke, Christian 1986 “Th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Class Fomation and Class Stuggle: On The Social Theory of Perrie Bourdieu.” in *Berkley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31

Koo, Hagen 2001, *Korean Workers: The Culture and Politics of Class Formati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Ithaca and London.

Mann, M. 1973 *Consciousness and Action among the Western Working Class*, London, Macmillan.

Ossowski, Stanislaw 1963 *Class Structure in The Social Consciousness*, New York, Free Press.

Thompson, E. P. 1963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Vintage Books, New York.

Weber, Max 1946 *Class, Status, Party*, In H. H. Gerth & C. Wright Mills(eds.) *From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 New York, Oxford Press.

Wright, E. O. 1985, *Classes*, London, Verso.

—— 1997, “Rethinking, Once Again, The Concept of Class Structure.” In *Reworking Class*, (ed.) By John R. Hall,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责任编辑: 张宛丽